

奉家山上永远的丰碑

杨亲福



红二军团长征司令部旧址。

通讯员 摄

你好！湖南国保

简介

红二军团长征司令部旧址，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娄底市新化县奉家镇上团村，始建于清末民初。旧址为典型湘中地区院落式建筑，占地面积约7000平方米。1935年10月，红二、六军团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决定突围北上。以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的红二军团3个师9000余人，分兵两路至上、下团村。红军到来之前，时为县议员的大地主奉世清躲了起来。红二军团长征司令部的首长便住进了奉世清取名的“竹园”，在此处设红二军团司令部。

这是发生在我老家新化县奉家镇的真实故事。奉家镇是红土地，有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二军团长征司令部旧址”，有湖南省第十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红二军团长征伤员救护所旧址”。这个“国保”单位和“省保”单位是同一历史事件的两处旧址。这一历史事件，给奉家镇人民留下了永垂不朽的墨溪冈无名红军烈士墓和杨梅界无名红军烈士墓。

这是行善，要收留的。问有几个伤员，战士说有好几个。他说，一两个就住他家里，有好几个就住祠堂里。两个战士说去看看祠堂，他答应了，三人启程前往祠堂。

过了桥亭，爬坡约两公里，穿过古树群，就见到一座四合院建筑——刘氏宗祠。四合院的牌楼是阁楼，围墙是青砖筑成，主体建筑为木结构，空间不小，能住好几个人。刘祚杰就是族长，但祠堂大门上了锁，钥匙不在他手里，天气寒冷，刘祚杰就把两位战士带进了刘菊人家。刘菊人热情接待，叫妻子做了中饭。战士说自己带了干粮的，只喝杯茶，但是，感情难却，两战士还是吃了中饭，但他们把身上的干粮给了主人。

交谈中，战士一个讲述红军的行军故事，一个补充，让刘祚杰、刘菊人，还有刚进来的刘春叔、刘文清、刘青峰、刘华先等人，听得如醉如痴。战士谈到被收留伤员的费用，大家望着刘祚杰，等他表态。刘祚杰毫不含糊表示，护理伤员是大家应该尽的义务，治疗费用以及衣、食、住、行都归族里负责！其实，湖南农民运动早在刘祚杰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刘氏宗祠是邹序龙任会长的锡溪农民运动协会报木分会旧址，而报木分会会长刘文波，不但是刘氏祠堂里的人，而且他家就在前面的刘家院子里。

中饭后，两位战士直接上了上团。刘祚杰召集刘姓人在祠堂里进行了商议，他先向大家通报了刘祚杰红二军团两位探路战士，战士要求他收留几位不能再行军的伤员，他一口应承下来的事。大家表示服从族长安排。会上，就被子、衣服、钱、粮及护理人员，一一摊派到户。会后，大家动手，进行了大扫除、建好了灶，打好了地铺、搬来了被子。

报木刘氏宗祠坐落在茫茫大山深处，是当地刘氏人政治、文化、生活之所，也是唯一的公共场所。当时，刘氏宗族居住在方

圆几公里的山坡上，只有一个群居院落和五栋散居板屋，所有山民都姓刘，但不足一百人。然而，这里却有一栋像模像样的祠堂。

刘祚杰家的板屋在祠堂后面的最高处，坐落在杨梅界的山坡上，他家距祠堂约两公里。他儿子刘春叔已经三十七岁，成了家，有了孩子。刘春叔特别勤奋，大雪天里，也上山劳动，不是挖冬笋就是捕野兽。晚饭后，刘祚杰向儿子介绍了族人准备收留红军伤员一事，他告诉儿子，红二军团将士明天过村里，他想让儿子带队，送将士们过风车巷。第二天一大早，父子就来到祠堂等候。

不到八点，昨天遇见的那两位战士来到了祠堂，带来了首长的亲笔信和伤员名单。不一会儿，红军大部队来了。战士把刘春叔送到队伍最前面带队。伤员在队伍的后面，到达时已过十二点，他们共九人，或被扶着或被抬着。

这样，九位伤员住进了报木古祠。其中的三个轻伤员住了一晚就走了，他们说能走，要追上队伍。于是，刘春叔又送他们，把他们直送到队伍驻扎地隆回县的黄金井。山路遥远，刘春叔在回家路上投宿农家，第二天才回到家里。

六个重伤员中的一个，在第三天晚上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一夜冷雨，山冈上，屋顶上和山道上都结了冰！怎么办？刘祚杰与刘菊人、刘青峰商量，既要尊重刘家的风俗，又不让外姓伤亡者葬在有人居住的山坡上，又要让战士有葬身之地。这样，地点定在杨梅界后山的报水井，没有棺材，用扮禾桶代替，没有棉被，用稻草代替。缺医少药，还有三位重伤战士，病情不见好转，急剧加重。刘祚杰不得不考虑他们的后事。

不到一个月时间，三个重伤员陆续辞世。他们被稻草包裹着，摆放在同一只扮禾桶里，最后用木皮盖了。

冬去春来，清明节就要到了，刘祚杰计

划给烈士墓培土，立块烈士碑。他去翻名单，却落了1首长的信、红军伤员的名单，还有护理伤员的记录，刘祚杰都收藏在同一只木箱箱底。他打开箱子，翻开上层衣服，见到箱底没有了文件，只有一个老鼠窝！所有文件，被老鼠啃咬得粉碎。

清明节那天，是一场颇具习俗、彰显礼仪的为烈士扫墓活动：宰杀雄鸡，刘祚杰、刘春叔、刘用荣一家三代人跪在坟头。这一年，刘用荣十五岁。刘氏族人，从此年年清明前来扫墓。

2013年3月，红二军团长征司令部旧址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奉家镇人民政府成立了“红二军团伤员报木刘氏宗祠救护所调研组”。

据调查，“红二军团长征伤员救护所旧址”六位重伤员，四位辞世，两位伤好后离开，其中的一位叫邹传虎。通过老党员刘用俊带路，调研组人员采访了邹传虎儿子邹新佳。邹新佳介绍，邹传虎没能赶上长征部队，流落深山成家立业。

邹传虎，祖籍新化县水车镇红光村。邹传虎参加红军后，被安排在贺龙身边管马。1935年12月，他跟随红二军团队伍从溆浦县进入上团，后又从上团过豆腐岩崇山峻岭风雨桥进入报木古寨，因伤病无法行走，留在刘氏宗祠疗养。邹传虎和另一名战友病情还没痊愈离开了刘氏宗祠。他们两人分头逃匿，沿途乞讨。邹传虎钻丛林，翻山界，找不到队伍，就躲藏在溆浦县的大竹园山界上，在那里结婚安家。

如今，红二军团长征伤员救护所旧址——报木刘氏宗祠，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列为湖南省第十一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杨梅界的无名红军烈士墓，是奉家镇“省保”的重要内容，也是“国保”的重要内容。

湘江观潮

在2024年人民文学奖的颁奖台上，董宇辉的“传播贡献奖”如同一枚投入湖心的石子，激起的不仅是涟漪，更是文学界与大众舆论的激烈交锋。

那些尖叫着“文学已死”、嘲讽董宇辉“不配”的声音，本质上是对文学人民性的无知与对传播力的傲慢偏见。

这场争议，恰恰暴露了中国文坛某些群体固守的精英主义痼疾，以及他们对时代变革的钝感。文学的人民性，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它要求文学走出书斋，与广泛的人民群众产生共鸣。董宇辉的直播间，正是这一精神的当代实践。

《人民文学》杂志在董宇辉的直播间4小时卖出99.2万册，成交额达1785万元。这场直播背后，是895万观众对文学的热切目光，是无数普通人因董宇辉的推荐重新捧起《额尔古纳河右岸》，让迟子建笔下的鄂温克族史诗在一年半内销量突破500万册。这难道不是文学人民性最生动的注脚？

某些批评者将“人民文学”狭隘化为“必须由人民创作”或“必须直接描写人民”，却忘了“人民性”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

董宇辉在直播间将《平凡的世界》中“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叙事与自身经历结合，让年轻人在弹幕中打出“原来文学可以如此贴近生活”。这种将经典文本转化为大众情感共鸣的能力，恰恰是对“人民性”最务实的诠释。反观某些自诩“纯文学”的作品，字里行间充斥着对读者的傲慢疏离，最终沦为圈内的互娱玩具，这才是对“人民”二字的背叛。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文学的危机并非来自董宇辉们的“带货”，而是来自某些守旧者将文学供奉成“不可触碰的神像”。他们一边哀叹“文学边缘化”，一边对直播、短视频等新传播渠道嗤之以鼻，这种精神分裂式的姿态，本质上是文学异化为脱离时代的文化化石。

董宇辉的价值，恰恰在于用接地气的方式打破这种僵局：他将《苏东坡传》中的文人风骨解读为“被贬黄州的公务员”，用“人生要耐得住寂寞”重构《百年孤独》的现代意义。这种“翻译”或许不够“学术正确”，但它让马尔克斯与迟子建走进了“996打工人的精神世界”。

那些讥讽“销量即正义”的批评者，不妨看看历史：明清小说的繁荣得益于说书人的市井传播，鲁迅的杂文影响力离不开《申报》《新青年》的大众媒体属性。今天的直播，不过是新技术条件下的“现代说书场”。

《人民文学》全年订阅常年徘徊在5万份时，董宇辉一场直播便让其销量暴涨16倍。这样的数据不是“坠落”，没有传播的文学，不过是印刷厂仓库里的废纸堆。

对董宇辉最恶毒的指控，莫过于将其奖项视为“文学向流量下跪”。这种论调暴露了批评者的双重标准：他们可以接受余华、莫言在短视频平台用“段子手”姿态与年轻人对话，却无法容忍董宇辉以“卖书人”身份登上领奖台；他们默认《人民文学》需要财政拨款维系生存，却对一场直播解决杂志社季度KPI的现实贡献嗤之以鼻。更深层的矛盾在于，某些人将“文学性”简化为“文本复杂性”，却对传播效能视而不见——董宇辉的直播间里，观众人均停留时长仅12分钟，但这12分钟的“看见”可能比某些“纯文学”期刊在书架上积灰的365天更有价值。

当《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坦言“希望重现20世纪80年代文学辉煌”时，他显然比批评者更清醒：那个时代的文学繁荣，恰恰建立在《人民文学》发行量破百万、作家与读者密切互动的基础上。

董宇辉获奖引发的争议，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文学评价体系的话语权争夺。传统文学界习惯用“纯文学/通俗文学”的二元对立维护自身权威，却拒绝承认网络时代文学生态的多元化。董宇辉的“传播贡献奖”，正是对这套僵化体系的突破：它承认文学价值不仅存在于创作端，同样体现在传播端。董宇辉让优秀的文学作品进入千万家庭，其文化意义绝不逊色于某些“纯文学”期刊上的晦涩长篇小说。

那些高喊“文学不应唯流量论”的人，不妨扪心自问：当余华《活着》销量突破2000万册时，他们可曾质疑过“销量污染文学”？当刘慈欣《三体》跻身世界科幻殿堂时，他们可曾嘲讽过“科幻不够严肃”？这种选择性的“纯洁性焦虑”，不过是既得利益者对新兴力量的恐慌。文学的真正危机，从来不是“太接地气”，而是“拒人千里”。

董宇辉获奖事件，是一面照妖镜，映照出中国文坛的两种面相：一边是拥抱变革的实践者，他们深知文学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代的同频共振；另一边是蜷缩在象牙塔里的卫道士，他们用“纯粹性”的锁链将文学禁锢成小众玩物。当后者用“遮羞布”“谄媚流量”等标签攻击董宇辉时，他们真正恐惧的，不是文学被“污染”，而是自己垄断解释权特权被瓦解。在这个算法重构一切的时代，文学若避免沦为文化遗产名录上的标本，就必须接受董宇辉们的“冒犯”。毕竟，真正的文学人民性，从不害怕走进烟火人间——它只怕在傲慢与偏见中，失去与人民对话的勇气。

董宇辉发布获奖感言。 通讯员 摄

董宇辉获人民文学奖，究竟「冒犯」了谁？

施俊杰

王德榜，被治军英名“耽误”了的水利专家

林汉筠

祖籍岭南、出生永州的王德榜(1837—1893)，曾随曾国藩转战各地，两次随左宗棠远征新疆，驱逐侵占伊犁的侵略者。后受命征战越南边境，为“镇南关战役”扬旗一面大旗，维护了祖国统一，战功彪炳，连左宗棠都称他为“楚军之冠”。

世人都知道他是一代名将，一个军事家，其实他还是一个水利专家。他的治水成就，丝毫不比他的治军成就逊色。

作为左宗棠的得力干将，在左宗棠赴任新疆期间，王德榜辅佐其兴修的水利工程几乎遍及新疆的各主要区域，水利建设从疏通河道、修建水渠、勘测凿井，再到加固、修整坎儿井。这一“水长城”，让西域大地，细细滋润，生机节节延伸。

同治十年(1871年)八月，王德榜在随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军“进剿”河州起义时，不幸身负重伤。在养伤中，他面对苍凉、萧索的洮阳川(隶属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不禁发出长长的惊叹。黄沙漫漫，掩盖了村庄，仿佛王昌龄《塞下曲》描绘的“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场景。

缺水，治水。一个想法冲上脑际，他要学共工治水！只是共工治水主要是根治水患，采取的治水办法是“堵”，即把高地铲平，低处填高，修筑堤防，用以阻挡洪水。他要治的是要引进水源，开凿河渠。说干就干，在黄沙拂面中，走山头、察地势、测水流，硬生生地从山西边开了一条“长七十里，广丈有六尺，堤高三丈五尺”“宽计丈余，横亘两崖”的河



潇水。

蒋长青 摄

渠，引到狄道东南部山坪区，解决了当地干旱缺水困难。同治十三年(1874年)五月晦日论功，清《列传》卷二百四十六对此做了记载：“潘狄道河渠，获沃壤百余万亩。降敕褒嘉，赐头品秩。”王德榜因此而被清廷赏头品顶戴。狄道百姓念其宏恩，立下纪念碑，并改地名以纪念。

北京永定河的疏通，是王德榜的另一个大手笔。

古时的永定河水患频发，流域两岸的百姓苦不堪言，“无定河”因此得名。光绪七年

(1881年)闰七月，王德榜奉旨入京，挥动铁杵，开启了永定河新的一幕。为做到军民融洽，他对部下立下“三大规律”，站成一个大大的“守”字。深谙水性的他，从生态角度，对永定河淤理、灌溉，达到消灭、造福的效果。炸山取石，在下苇甸、丁家滩、水峪嘴、车子崖和琉璃局山嘴处，兴建了五处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开凿了“城龙灌渠”即城子至卧龙岗的灌渠。为便于当地灌溉，还在三家店到麻峪段修建了一些附属水利设施。疏通的河道，得来了盈盈湖泊，造福于民。麻峪村百姓

为感其恩德，还将王德榜像供奉于龙王庙内，享四时祭祀。

慈禧太后也发出恭亲王、醇亲王奏的《懿旨碑》：“伏乞皇太后慈鉴，仅奏，饮命头品顶戴，赏穿黄马褂，奏办直隶顺天河务，前福建布政使，达冲阿巴图鲁，随带军功加三级王德榜恭录。”“光绪七年十月二十日，醇亲王到京。前宣福建使王德榜立”的摩崖碑石刻，篆中带隶，银钩铁画，仍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妙峰山镇丁家滩村的一块巨石上张扬着。

“统师徒，杀水势，燕民从此乐熙熙”。在北京市京门铁路2号隧道外侧，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处石刻——“钦命头品顶戴赏穿黄马褂奏办直隶顺天河务前福建布政使达冲阿巴图鲁楚南王德榜题”，时间为“光绪捌年孟春月”。遒劲刚毅，沉稳而不失俊逸，字之与石之势相辅相成。记载着清光绪年间治理永定河、兴修水利工程的往事。这一石刻，像这个汉子站在江心，指挥着这条桀骜不驯的河流。

他大智，又大愚。在零陵，有一座蘋洲书院，是湖南四大书院之一，就是王德榜在贵州布政使任上，与同为“湘军”大将的席宝田不计得失共同捐资兴建的。与此同时，还捐资兴建凌云塔，重建府学宫。

他大拙，又大巧。寓居江华时，为打通了永州南北交通的瓶颈，在零陵资水河与潇水河交汇处建青石大拱桥，出资修缮江华码市至广东清水的10公里石板路；还疏通码市至下游东江的河道，使当地水上交通上下通畅。

河流，还是河流。王德榜如河边渔翁一般耐心、熟知水域生态。他为治水的手段，注入了清澈的人类学思考。